

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中国边疆学 学科体系构建

范恩实

摘要：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摆脱研究领域的影响，未能从人才培养、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推进边疆问题研究等角度思考一级、二级学科规划，特别是回避了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的问题。从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看，边疆研究要完成对边疆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记录与认知，在此基础上，开展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边疆问题研究，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利用。由此再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则中国边疆学应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其下再设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等二级学科。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C0、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2）05—0103—09

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然而，就其学科体系而言，仍不能达成广泛共识。学科体系需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研究对象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如何进行研究。何谓边疆，前人讨论较多，虽然也有一定的认识分歧，但是主流仍是以陆疆、海疆为中心。所研究的问题则纵贯古今、横亘边疆社会，涉及历史疆域演变、边界形成、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边疆与周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当代边疆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等，此亦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欲治此问题庞杂之学，究以何种方法入手。在普遍认可中国边疆学将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前提下，又如何实现学科有机融合、形成逻辑体系。进而可以有效指导科研与人才培养实践。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

从以往学界的相关论述看，有的学者主张以一门学科为核心，如历史学（李鸿宾^①）或政治学（吴楚克^②）；更多学者则将边疆研究问题或领域作为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如邢玉林^③、马大正^④等先生，甚至郑灿先生著《中国边疆学概论》也未能超越这一学科构建想法^⑤。马大正先生在晚近的一篇论文中，已经作出反思，“笔者曾在《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一文中提出‘根据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中国边

作者简介：范恩实，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

①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参见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参见郑灿：《中国边疆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疆学的内涵可包括两大领域，暂以‘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来命名’。并在此后的文章中多次重申了这一认识。但经过多年科研实践的思考，笔者认为上述认识并非符合学科发展的最佳选择”^①。马先生提出的新方案是设立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显然，在照顾学科体系的同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研究领域的影响，特别是未能进一步做一级、二级学科的系统规划。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建构二级学科的时候进入到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如毕天云《中国边疆社会学》^②，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③以及梁双陆《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④等。但作者大多将其列为已有一级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二级学科，而较少从构建新的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的角度思考学科定位问题。

总的来说，上述构想或过于狭窄，或不能超越研究问题而深入到学科体系构建层面，因此均有明显局限性。特别是无法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找不到学科定位，更加不利于人才培养机制的确立与实践。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入手，梳理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

一、王朝时期对边疆的记录和认知

追本溯源，中国边疆研究起源于王朝时代对边疆的记录和认知。王朝时代的边疆，是指王朝匀质化统治之外的地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即形成“五服论”的“中心—周边”关系理念，指以天子为核心，根据距离和亲疏划分出五个同心圆，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为甸服，环绕天子建立起来的列国为侯服，侯服之外为绥服或宾服，其外是要服和荒服，这种对不同圈层施以不同统治策略的理念，是为边疆思想的滥觞。西周实行分封制，是对“五服论”的践行，金文中反复出现“柔远能迩”一词，意思是说安抚远方国族，使其柔顺，与中央王朝友好相处，此远方的国族，即为与中土不同而又进入中原王朝统治视域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在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虽然中原王朝对其统治的方式不断变化，但是大体上可视为中国王朝时期的边疆地区。

这类与中原地区相异的边远地区的记录与认知，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滥觞。其中起源最早的是对边疆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的记录，如《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礼·职方》《尔雅·释地》《管子》等。同时也有《逸周书》这样的文献，记录异质化的边疆族群。这样的记录传统为后来的《史记》《汉书》发扬光大。《史记》列传按地域撰写了《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西域列传》《朝鲜列传》，从而开正史《四夷传》的先河。《汉书》除延续《四夷传》外，还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书写范式。这两类书写范式，为王朝时期边疆记录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由多种体裁著述共同构成的边疆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文献。

这些记录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个学术传统——实录，实录也是中国史学的最重要传统。实录概念，最早见于两汉文献，指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之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这一史学优秀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记录。虽然边疆知识获取相当不易，但史家本着客观求真精神，通过借助王朝时代的档案传统，并辅以实地踏查，仍然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

中国古代的档案传统，从文献记载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夏代，而商代甲骨文已充分证明其存在。总

① 马大正：《中国边疆理论 and 实践建设的当务之急》，赵环宇等主编：《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报告（2016）》，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② 参见毕天云：《中国边疆社会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③ 参见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④ 参见梁双陆：《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⑤ （东汉）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体而言,历代王朝的档案搜集、保存机制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逐渐形成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为核心的中央档案机制。由时政记、起居注汇编而成日历,再补充而成实录,最终成为撰修国史的基础资料,其中自然包括中央政府层面的边疆论议与决策。在地方层面,则主要是信息征集,例如隋王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①。唐代明文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地图(后改为五年),连同户籍一起上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司,其中当然也包括沿边各地^②。唐代沿边地区多设置羁縻州,虽然《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开篇即称“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③,然而实际情况并不绝对,根据两部《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不但大部分羁縻州有详细的行政建制记载,相当部分羁縻州也有户口统计。

此外,对于边疆地理、族群还另有一套系统的信息征集制度。《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条载:“其外夷每有蕃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④《唐会要·史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也记载:“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⑤唐代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和发扬。

在唐代官修正史以前,尽管没有如此具体的有关边疆史料来源的记载,但从史书本身所反映的情况看,一旦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接触增多,相应的正史对相关族群的记载也就愈加丰富,如汉代张骞通西域,西域各族群与汉朝联系增多,于是《汉书·西域传》的内容就丰富起来;又如三国时期魏将毋丘俭伐高句丽,于是《三国志·东夷传》的内容也就明显增多并更加准确。

除了官方修史对边疆知识的萃集外,实地踏查也是边疆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由此留下了一批边疆游记、旅行记、考察记类作品。这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西晋法显著《佛国记》,唐玄奘述、辩机编《大唐西域记》,唐杜环著《经行记》,元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等。

在上述官私著述基础上,形成了专记一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其中亦不乏以某一边疆区域为中心的方志作品。根据史书记载,此类著述颇丰,但是传世者较少,例如,袁康与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等。

在以实录精神记录边疆知识的基础上,基于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需要,王朝时期也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边疆认知传统,这可以看作是边疆研究的第二个学术传统。

此类知识分作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边疆族群、社会的认知,包括对各族群历史发展线索的追溯,对族群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层次的评述,对各族群建立的边疆政权的结构特征的描述、类比等,以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来,这些认知并非来自科学的分析、归纳与演绎,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族系源流线索、族群文化特征,以及从比较分析的视角阐释的边疆族群社会发展阶段、政权统治结构特征等内容,皆包含一定科学研究的成分,其传统亦为今日边疆研究所继承。

第二层次则是对边疆形势的判断,以及治边思想的提出和治边政策的制定。此又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史家论赞的形式阐发的对边疆的认知。如《史记·南越列传》篇末载:“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器。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瓠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后亡国,征自繆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后。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⑥《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篇末载:“赞曰:楚、粤之先,历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践亦以粤伯。秦灭诸侯,唯楚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粤灭国迁众,

① (唐)长孙无忌:《隋书》卷33《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8页。

②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③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

④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第162页。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89页。

⑥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7—2978页。

繇王居股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① 第二类来自君王与朝臣的论议，以及由此形成的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如唐灭东突厥后，关于如何安置突厥降众，朝士多有论议，唐太宗择善而从^②。再如唐代朝臣关于边疆进退的讨论，著名的有崔融“拔四镇议”^③、狄仁杰《请拔安东表》^④等。

综合上述，王朝时期有关边疆的记录与认知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两大优良传统，即实录与基于经世致用目的的边疆问题分析、论辩。如果就研究方法加以总结的话，首先是资料来源，注重档案等各类官方信息的汇集整理以及通过实地踏查对边疆知识的获取；其次是资料辨析，主要依靠传承自汉学的考证训诂、校勘辑佚；最后是分析论断，超越宋学的性命义理之辨，更加强调经世致用。而就著述体裁而言，已经可以找到当代民族史、地方史研究的先声。

二、清末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三次学术高潮

（一）传统边疆记录与认知的鼎盛时代——清末西北舆地学

19世纪40年代以后，清王朝的边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西北陆疆，激发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热情，于是西北舆地学应时而兴，中国边疆研究进入了清末以后的第一次学术高潮。其学术传统则仍不外实录与经世致用，以此形成对边疆人文、地理的系统认知，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批学者是“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名其家者”^⑤。

从著述内容看，首先是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做的校证和注疏，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史料，加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如何秋涛等整理、校订《圣武亲征录》，徐星伯、沈增植等校正、笺注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李文田、范寿金注释、补阙耶律楚材《西游录》，丁谦考证张耀卿《耀卿纪行》等。其次，在整理传世文献之外，边疆舆地学也以传统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形成一批新的重要著述。其中代表作包括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何秋涛《朔方备乘》、魏源《圣武记》等。

从研究方法看，上述著述恰是王朝时期边疆记录与认知方法的发扬。其一，资料之萃集，既有官方史籍、内府档案、私家著述，兼及实际考察所得；其二，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之法辩证史料；其三，著述体例不外乎史籍之传、志、表等；其四，从著述内容看，以地理考证为空间背景，以追溯族群源流及有关史事为时间线索，以阐明诸边疆族群政权之制度体系为重要目标；其五，此类著作撰著的目的均是经世致用，以有助于治边安边为总目标。

（二）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传入与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学术体系逐渐传入，边政学应运而生。此为清末后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学术高潮。从研究方法看，边政学改变了以往边疆问题研究记录与认知的局限性，即以官私记录、庙堂论议为主，但是边疆第一手资料严重不足，特别是没有边疆社会基层组织、人群的调研资料，加上缺少科学分析方法，除对边疆统治有所资助外，对于边疆建设缺乏指导意义。

边政学是在中国孕育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支撑边政学发展的有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则是边政学发展初期的核心支柱。民族学学者研究边疆问题，虽亦重视旧资料的搜集、整理，但主要还是以民族学方法

① （东汉）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68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5—6077页。

③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1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5—2216页。

④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169，第1725页。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1页。

的边疆调查为依托,系统全面、翔实可靠地记录边疆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深入认知边疆奠定了广泛的资料基础。

当然,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也并非完全抛弃传统边疆实录与认知体系,正如林耀华所指出,边疆研究首先要了解边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要以史地为基础;其次是研究边民的个人行为方式,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人群团体的系统性,乃至于边疆社会制度;最后达于边疆文化。^①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一文,详细阐述了民族学边疆调查的内容与方法。其中内容有15项,包括地理环境、种族、人口、语言、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教育、道德、消闲、医药卫生、社会传说、社会禁忌、国际关系,每一项下又细分多个条目,可谓涵盖边疆地区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边疆调查仍甚少能做到如此细致、全面。他提出的研究方法则有20种,包括图书法、问卷法、人格分析法、摄影法、观察法、访问法、社会个案法、语言法、征集法、购置法、地境法、测验法、量度法、地图法、清丈法、抄录法、绘制法、统计法、考古法、工艺法。^②

边政学第二个核心支柱是政治学。吴文藻先生指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就政治学研究方法而言,吴先生认为:“普通政治学上所建立的原理原则,都可以应用到边疆政治研究上去。……地缘政治学,对于边政学可有独特的贡献。”^③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可称为地理政治学。如果以之研究边疆,实际上就是以各类边疆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为基础,以政治学方法加以分析,重点解决边界形成、边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结构,以及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政治问题。显然,这些也是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的新中国边疆研究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由此推动中国边疆研究走向第三次高潮,也使中国边疆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有了科学指引,并逐渐形成体系化的学科理论、知识基础。作为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发展。

其一,马克思主义疆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疆域研究。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家、民族、疆域的论述有力推动了有关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促进学术界超越王朝国家疆域观念的束缚,为中国疆域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体系框架。

其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理论指导下的边疆民族研究。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下,全面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由于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边疆省区,因此上述民族调查、识别以及丛书编写工作均与边疆研究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学术界的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学术成果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对正确认识民族的历史形成,各民族历史关系,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斗争等关键问题发挥了指导作用。

其三,唯物史观与边疆族群史、当代边疆社会发展等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开辟了科学道路。在边疆族群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系列科学分析工具,如生产工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结构分析,生产方式变化与社会组织演进的关系,等等。

①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合期。

②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合期。

③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合期。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从经验事实出发，寻找事物的“内在理性”，发现科学抽象（概念），最终实现理性具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边疆研究更加注重理论建构、科学分析和理论实践相结合，从而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打开了新的局面。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边疆工作大局，回应边疆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基础研究需求，全面继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倡导并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即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先后组织编写《中国近代边界史》（吕一燃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林荣贵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马大正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马大正等著）等学术著作，系统、全面地总结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工作，站在学术最前沿，整体推进有关研究，出版重量级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下，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①。

在集中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同时，随着国家发展对边疆现实问题研究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也开始关注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推进边疆现状研究。201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紧紧抓住新时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新的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全面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学科新格局。

正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术引领和组织协调下，全国的边疆研究进入第三次高潮期，在全面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对边疆记录与认知传统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更加多元，应用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形成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多学科的介入使边疆研究的方法手段更加丰富，涉及的研究范围日益广泛，获取的研究结论也更加科学。

三、从边疆研究实践看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学术高潮方兴未艾的时代，当学者们大声呼吁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时候，所面对的局面又远比第一、第二次学术高潮时期要复杂，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与现有学科体系兼容。按照西北舆地学来看，放到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即可；按照边政学来看，放到政治学学科门类下即可；但是，当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将众多学科卷入其中后，边疆学列入哪一个既有学科之下均存在明显的不兼容。

当前，中国学科体系建设正经历变革期，除已有学科调整外，正式设立交叉学科这样一个兼容性更强的新学科门类，其下已设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由此也给明显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的中国边疆学一级学科建设打开了一扇新门。

那么如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构建中国边疆学一级学科呢？首先看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科建设的规定。2009年2月2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其中有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标准为：

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一级学科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

（二）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

（三）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四）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

有关二级学科的设置标准为：

二级学科是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二级学科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① 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97—100页。

(一) 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二) 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

(三) 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需求。

结合前文梳理,对照上述规定,笔者认为中国边疆学作为一级学科是基本符合要求的。其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经过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

那么如果说将中国边疆学纳入交叉学科下一级学科,又如何构建它的学科体系,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以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呢?由此思考,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基础,换句话说,要进入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必须具备的基础性专业素养是什么?本文对中国边疆研究传统的梳理充分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边疆历史学和边政学,按照前文梳理的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史的经验,这两个学科可以提供边疆研究基础资料的获取并形成基本认知。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介入则是在此基础上,就某一个方面更为深入地研究边疆问题。

因此,在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下,第一个二级学科应该是中国边疆历史学。至于中国边疆历史学为什么要在历史学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独立出来,列为中国边疆学的二级学科,依据在于:一是其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即历史时期的疆域范围、边疆族群社会、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及当代国家边界的历史形成过程等,其中边疆、边界等概念和相应的研究范式贯穿始终;二是研究目的和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三是研究方法均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需要结合文献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四是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不能充分掌握相关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就不能够胜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从边疆研究学术史看,另一个发挥基础作用的二级学科应该是边政学,从内容上看则是以民族学方法开展的边疆社会调查与研究。但是,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民族学已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既包括一般的分支学科,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宗教、民族艺术等,也包括特殊的专门学科,如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突厥学、纳西学等学科。狭义的民族学通常等同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①。而从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看,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包括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几个二级学科。显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民族学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上了。同时,考虑到时过境迁,边疆社会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他者。如果从研究实践对理论、方法的需要看,对当代边疆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更应该借助于社会学。

有学者已经编写了《中国边疆社会学》一书,对于利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开展边疆调查、研究做了系统论述。大多学者更愿意将中国边疆社会学归入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然而在笔者看来,社会学是不会接纳这样一个二级学科的,因为社会学下已有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如果中国边疆社会学不以边疆研究为目的和指导,就无法突出其特殊性。实际上,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正是把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边疆社会调查与研究,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特殊性提升学科理论体系,从而形成新的学科。中国边疆社会学如果想发展为一个二级学科,边政学的成功路径是不二之选。

除了上述两个基础性的二级学科外,还可设立应用型二级学科。首先是中国边疆政治学。该二级学科以边疆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核心问题是边疆治理,这也是边疆研究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呈现。同时,边疆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得政治学的一般原理以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分支为主线,围绕边疆问题开展具有较高独特性的研究,从而为边疆政治学二级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中国边疆经济学。梁双陆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一书,明确提出构建中国边疆经济学。同时,这也是目前以中国边疆**学为名称的二级学科构想中,唯一积极

^① 何星亮:《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靠拢中国边疆学的。该作者明确提出：“边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将边疆经济纳入学科构成的一部分，正在发展之中，将会对边疆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边疆经济发展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随着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新的学科也将会不断应用于边疆经济研究之中。”^①当然，其仍然是从融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为一体的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为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经济发展提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由于经济学对数学分析的依赖，使中国边疆经济学的学科构想更依赖于经济学本身，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来看，边疆特色并不鲜明，因此是否列为中国边疆学二级学科还有待更多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

马大正先生曾把边疆研究分作基础领域和应用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考古、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应用研究领域包括：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自然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②如果做对照检核，本文所构想的二级学科，基本涵盖了上述中国边疆研究领域。

至于说上述二级学科之间存在何种相近的理论基础：首先，各二级学科均以中国边疆定义及其基本特征认知为前提；其次，中国边疆历史学是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的基础，是各学科理论提升、方法创新的知识源泉，是正确研究当代边疆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最后，由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对象涵盖整个历史时期的边疆社会，研究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当代边疆治理，因此理应特别重视理论、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应综合利用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全面推进对有关历史问题的系统认知。由此，既建立起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与其他二级学科间的知识体系关联，同时，也有助于明确中国边疆历史学与历史学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其他二级学科的区别。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进一步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列出基础课程计划，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边疆学理论、中国边疆学研究法、中国边疆历史概要、中国边疆社会学概论、中国边疆政治学概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等。

综上所述，本文所设想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如下：

- 门类：交叉学科
- 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
- 二级学科：中国边疆历史学
- 中国边疆社会学
- 中国边疆政治学
- 中国边疆经济学

四、结 语

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往往疏于与教育、科研实践相结合。构建一个学科，必须要回应一系列问题，是针对社会什么样的知识需求？如何培养人才以服务于这一需求？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队伍的实际情况，尚与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与学科体系构建不完善，缺乏指导性有直接关系。

首先，学科体系建设要解决后备人才培养问题，由此才能实现学科的代际传承，生生不息、蓬勃发展。希望有条件、有意愿的教育机构能够建立中国边疆学院（系则不足以支撑交叉学科教学需要），设置中

① 梁双陆：《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第52—53页。

②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

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社会学基础课程，从而真正培养出具有中国边疆学知识素养的学科接班人。而为了更好地研究边疆具体问题，在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可以增加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课程，以加强边疆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

其次，学科体系建设要发挥学术引领作用，能够凝聚人才队伍、指明学术方向、提升学术能力，从而更好地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学术问题。目前的人才队伍来自不同的相关联学科，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中国边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素养，没有将本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边疆研究实际有机结合，一方面易于固守原学科研究领域，难以全身心投入到边疆研究中去，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快适应边疆研究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明确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予以指导，哪些是基础二级学科，哪些是应用二级学科。通过基础二级学科的培养，掌握中国边疆研究基本理论、方法和知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应用二级学科领域寻求更专业化的研究。

最后，构建学科体系，还需要考虑学科人才的社会需求问题。作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其培养的人才除一部分高层次的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外，大部分可以直接服务于边疆地区建设。当前，国家有一系列重要发展战略围绕边疆地区展开，或者边疆地区承担重要责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边疆等特殊支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而边疆地区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了上述战略的实施。可以说，边疆地区发展正亟需大量真正懂得边疆社会历史、现状的人才，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完全符合这一社会人才需求趋势。当然，基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知识的学习，相关人才也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寻求就业。至于学位授予方面，在本科生阶段应以两个基础二级学科为主，根据各培养机构实际培养情况，或者历史学、政治学分别授予，或者集中于政治学。到研究生以上阶段，则可以根据其所选二级学科的专业领域，分别授予历史学、政治学或经济学学位。

Problem Consciousn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FAN En-shi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main problem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is that it did not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research fields, failed to conduc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ciplin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promotion on frontier issues and especially did not keep 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ing disciplin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 methods, frontier studies should finish the recording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social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rontiers. In light of this basi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frontier studies for practical use.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essential to comprehensively utiliz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archaeology, geography,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us, if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ing discipline system,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should be the sub-level disciplin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under which there are secondary disciplines such as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 Chinese frontier sociology, Chinese frontier politics, and Chinese frontier economics.

Keywords: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Discipline Syste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赵蔚平]